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

——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文本修改为中心

汪效驷¹, 阮平²

(1.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2.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的一部经典著作。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策略》作过一次实质性的修改。这次修改主要反映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明确将民族资产阶级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和工作范围;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许多重要策略、表述进行了与时俱进的修改和发展;突出强调了国际援助尤其是苏联援助在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中的首要地位。它的修改,实际上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中统一战线实践的基本经验总结和现实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思考,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方法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文本修改;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1.12.017

近些年来,对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的研究成为毛泽东研究的一大热点。《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以下简称《策略》)是较为全面系统反映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一部经典著作,但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在文本修改和版本考证方面的基础研究尤为薄弱。^{〔2〕}本文拟利用搜集到的资料初步考证、分析和探讨《策略》文本的历史演变、有关统一战线内容的修改及其对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重要意义,以深化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研究。

一、《策略》文本的历史演变

1935年10月,长征胜利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北迅速扎下脚跟,能够集中精力思考当时政治走向和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年,国内外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内,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大规模“剿共”之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华北事变”,企图直接控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国民党此时仍不放弃不抵抗主义,在倾力“剿共”的同时,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退让。

作者简介:汪效驷,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抗战史;阮平,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研究。

〔*〕本文系安徽师范大学庆祝建党百年专项课题重点项目“新四军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在国际上,世界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与矛盾日益加剧。共产国际根据国际反法西斯形势的变化,开始调整对中共政策的指导,提出把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就在中共中央启动战略转变之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被派遣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3]中共中央即于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瓦窑堡会议)。在会上讨论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时,毛泽东和博古产生了较为激烈的争论,^[4]与会的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在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通称《瓦窑堡会议决议》)。不久,此决议发表在1936年1月14日西北局《斗争》第81期(以下简称1936年《斗争》决议本)。

12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和共产党的策略任务》(以下简称《策略任务》)的报告。该报告随后发表在1936年1月3日、2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斗争》第80期、第83期(以下简称1936年《斗争》本^[5])。毛泽东作此报告的目的,主要有三个:第一,是为了传达和贯彻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第二,为了深刻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如毛泽东在《策略任务》中3次点名批评了张国焘,指出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军阀主义倾向”,驳斥了他“怀疑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的悲观失败主义论调;^[6]也点名批评了李立三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即革命开始转变之时”^[7]的“左”倾错误论断;还不点名地批评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不但对今天已经变化的政治形势“不认识或认识不足”,而且连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处理与地主资产阶级关系的“历史也忘记了”。^[8]第三,为了推动“抗日讨卖国贼的社会舆论”。^[9]单从报告的标题来看,标题前半部分“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可以让受众把“殖民地危险与蒋介石的卖国罪恶”^[10]相联起来,而标题的后半部分“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任务”则可以引起受众关注中共政策任务的转变。这种标题无疑能够配合中共的舆论宣传。

从全面抗战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一些中共根据地和解放区陆续出版过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这些《毛选》有的内部出版,有的公开发行,均未经作者审定。所以从1949年起,中共中央就着手编辑一部权威的《毛选》,以便于宣传毛泽东思想,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 and 道路。毛泽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并亲自主持这部《毛选》的编辑工作,田家英和陈伯达、胡乔木是参加编辑工作的主要成员。其中,毛泽东主要是修改《毛选》1—3卷的初选文稿,审定第1卷的篇目,撰写第1卷部分题解和注释。^[11]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策略任务》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并改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将其收入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以下简称1951年《毛选》本)。相较于1936年《斗争》本,1951年《毛选》本删改篇幅过半,^[12]文本框架有所调整,文字规范凝练,内容更富有理论性。关于修改的具体变动情况可参考下页表格。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报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从未被收录于各地方出版的《毛选》,也很少看到其单行本公开发行,^[13]究其原因,有两个因素值得考虑。一是1936年《斗争》本的篇幅过大,表述口语化,很不规范,影响了其传播和发行。二是这篇报告未收入中共中央书记处1941年编印的《六大以来选集》等党内文献集,而像这样重要的文献集是各地编辑《毛选》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1951年《毛选》收入这篇报告是和它的理论价值、历史意义有关。这篇报告的题解对此有所阐述,它高度肯定了瓦窑堡会议,“充分地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

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指出了“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对政治策略上的问题“作了最完整的分析”。^[14]参加《毛选》编辑工作的胡乔木在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对这篇报告的评价,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它的理论价值,他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报告就不但规定了当时党的政策,预见了中国政治的后来的发展,而且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本经验,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

本路线”。^[15]胡乔木高度肯定了它“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是有根据的,毛泽东虽然没有在报告中提炼和概括指出新民主主义总路线,但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领导权和前途等基本问题的论述大体上是正确的,涵盖了新民主主义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和思想。很明显胡乔木的这个评价高于《毛选》题解对它的评估,认为这个报告的理论价值不限于党的政治策略的微观层面,而且还在于指导政治策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宏观层面。

表一 1951年《毛选》本对1936年《斗争》本修改的统计表^[16]

变动/修改内容	字的变动/修改	词的变动/修改	句的变动/修改	自然段的删改	其他处理	标点符号	合计
统计数	335	391	182	44	49	— ^[17]	1001
占变动总数比	33.4%	39.1%	18.2%	4.4%	4.9%		100%

表二 三个文本的标题和各小节标题之对比

文本的版本	1936年《斗争》决议本	1936年《斗争》本	1951年《毛选》本
文本标题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和共产党的策略任务》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文本一级标题	(一) 目前形势的特点	(一) 提纲	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
	(二) 党的策略路线	(二) 目前形势的特点	民族统一战线
	(三) 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三) 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	人民共和国
	(四)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四) 国防政府, 抗日联军	国际援助
	(五) 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	(五)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六) 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	(六) 结论	

二、1951年《毛选》本有关统一战线内容的修改

与1936年《斗争》本进行比较分析,1951年《毛选》本在许多问题上的论述作了重要修改,主要反映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变化,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明确将民族资产阶级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和工作范围

首先,更加准确评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第一,恰如其分地估计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动

摇性。如1951年《毛选》本把1936年《斗争》本中的2处“地主资产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18]分别修改为“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19]和“地主资产阶级”^[20]。地主资产阶级在文中有着负面色彩和反动倾向,上述修改有助于正确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避免把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买办阶级混为一谈。再如,1951年《毛选》本把1936年《斗争》本中的“他们又为革命所吓坏,因而叛变出去同地主买办阶级结了个同盟,成为坚决的反革命者”修改为“随后

又为这个革命的火焰所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即蒋介石集团那一方面去了”;把“他们抛弃了革命朋友工农阶级之后,和他们的反革命朋友地主买办阶级住在一块儿”修改为“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21]上述的“他们”均指民族资产阶级,修改后说明不再把民族资产阶级视为“坚决的反革命者”,而是作为一个动摇的“同盟者”,语气也较为和缓有度,这与对待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集团有明显不同。第二,更多地肯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1936年《斗争》本:“因为他们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半革命的以及假革命的面目而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22]1951年《毛选》本:“因为他们中间除了那些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23]前者的“他们”是指“第三营盘”,其“阶级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但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再则还有富农与小地主”。^[24]后者的“他们”是指“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人称指代发生重要变化;增加“除了那些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删除“假革命”,这些表明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得到更多的肯定。

其次,把民族资产阶级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和工作范围。第一,充分肯定了在民族危机下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转变的可能性。1936年《斗争》本:“但是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口号,在形式上看来,似乎只是代表工农,不如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口号之在形式上在实际上包口了全民族的革命民众。”^[25]1951年《毛选》本:“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26]修改后有针对性地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转入抗日阵线的可能性。第二,明确把民族资产阶级列为中国革命可能的动力。1936年《斗争》

本:“虽然如此,革命的基本动力,到底在于工农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力,但不是基本的动力,这是全部正确的估计。”^[27]1951年《毛选》本:“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28]此句修改较大,在“小资产阶级”前增加“城市”,是为了与“农民”阶级区分开来;明确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纳入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增加了对“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成为中国革命基本动力的判断。第三,明确提出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斗争》本:“党的任务是把苏维埃红军、游击战争的运动同全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少数民族以及第三营盘等一切的革命形势会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民族战线……”^[29]1951年《毛选》本把上述的“工人、农民、兵士、少数民族以及第三营盘”修改为“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30]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和工作范围。

(二) 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许多重要策略、表述作了与时俱进的修改和发展

其一,弃用“国防政府和国防联军”这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高组织形式的政治主张。如1936年《斗争》本:“而日本与蒋介石灭国与卖国的政策,不能不驱使很多的力量跑到我们方面来,或者径直加入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队伍,或同共产党苏维埃红军取联合战线,而同处在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这个大组织中,这两种形式是同时存在的。”^[31]1951年《毛选》本:“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灭亡中国和出卖中国的政策,不能不驱使很多的力量跑到我们方面来,或者径直加入共产党和红军的队伍,或者同共产党和红军结成联合战线。”^[32]删改的部分表明,联合战线不再有两种组织形式,只能加入或依靠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又如,1936年《斗争》本:“如果说苏维埃政府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的话,那国防政府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还加上一切其他阶级,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的政

府。”^[33]1951年《毛选》本：“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分子。”^[34]修改的部分表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形式是由中共领导“过去的政府”团结和吸纳“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分子”而形成的，而不是另外再成立一个“国防政府”。再如，1936年《斗争》本：“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队伍不能希望他有如同苏维埃红军一样程度的巩固。”^[35]1951年《毛选》本把上述“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修改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6]采用成熟稳定的政治表述。据笔者统计，类似的修改共有5处。

其二，弃用外来话语和口号“苏维埃”，并对“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称呼、国体、任务、地位和政策等作了与时俱进的修改。第一，据统计，1951年《毛选》本对1936年《斗争》本中的90处“苏维埃”一律删除或改写。其中有70处删除，改写的20处具体情况如下：7处苏维埃改为人民共和国或人民共和国政府，5处苏维埃改为共产党，3处苏维埃分别改为我们过去的政府、我们的政府、这个政府，2处苏维埃改为我们，1处苏维埃运动改为土地革命，1处苏维埃改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1处苏维埃纲领改为反帝反封建纲领。这些修改说明毛泽东关于人民共和国的理论和话语都有了发展变化。第二，关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体的细微变化。1936年《斗争》本：“拿政权的构成来说，他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国家，拿国家的纲领来说，他又是全民族人民的国家。”^[37]1951年《毛选》本：“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38]前者省略的主语是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修改后，人民共和国的阶级构成呈现出反帝反封建的特点，很好地契合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第三，关于苏维埃政府革命任务的变化。1936年《斗争》本：“如果说苏维埃政府是为着完成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两个任务的话，

那国防政府就是为着完成民族革命一个任务的政府，并且在目前是为着完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这一个最具体的任务的政府。”^[39]1951年《毛选》本：“在目前，这个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40]修改后不提苏维埃政府的土地革命任务，是为了适应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主要矛盾的新形势。第四，上文中提到有5处苏维埃改为共产党，表明修改后以中共取代苏维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心支柱地位。^[41]如1936年《斗争》本：“只要苏维埃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必然也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苏维埃红军在国防政府中的领导作用。”^[42]1951年《毛选》本把上述的“苏维埃”修改为“共产党”，“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修改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体现出是中共而不是苏维埃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还如，1936年《斗争》本：“如果现时还没有苏维埃红军的话，则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即使能形成也不见得是得力的。”^[43]1951年《毛选》本：“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44]把“苏维埃”修改为“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反映出只有日益成熟的中共才能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五，关于苏维埃政府工商业政策的变化。1936年《斗争》本：“苏维埃在资产阶级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实际）废除私有财产，并不没收资本主义商业……而且还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45]1951年《毛选》本：“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46]修改后，根据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及长期性，在政策上有针对性地区别对待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与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外国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三）突出强调了国际援助尤其是苏联援助在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中的重要性

在建立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毛泽

东还在科学分析中国与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更加深刻认识到争取国际援助在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中的重要性,尤其是苏联在国际上对中国援助的首要地位。从表二可知,只有1951年《毛选》本单列“国际援助”一节与文中其他几个重要部分并列,可见毛泽东对“国际援助”的高度重视。在内容修改上,1951年《毛选》本增加了不少的新内容。如1936年《斗争》本:“一切反帝国主义反剥削阶级的战争都是义战。”^[47]1951年《毛选》本:“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48]这说明战争的人民性关乎战争的性质。再如与1936年《斗争》本相比,1951年《毛选》本增加一句:“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49]联系文中语境,该句旨在说明在帝国主义把世界紧密连在一起的条件下,国际援助对于革命的必要性。上述修改的关于义战和国际援助必要性的新论述,为中国援助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另外还增补了一大段内容尤其值得关注:

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说,我们是孤立的。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继续向有利的方面改变。我们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50]

增补的这一段,简明扼要指出了中苏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苏联援助在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中占首要地位,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结合起来使中国革命脱离了过去的孤立状态,并朝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些补充内容既是对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形成的历史经验的高

度总结,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缔结同盟,两国关系更加团结紧密的现实反映。这些内容准确地揭示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呈现出抗日战争的基本历史走势,暗含新中国成立后发展中苏关系的历史依据和现实需要。这些修改已经与1936年《斗争》本中“(二)目前形势的特点”和“(六)结论”两节中有关苏联和世界革命力量的论述有许多不同了。

总而言之,从《策略任务》到《策略》,很好地折射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从发展到成熟、完善的过程。修改前后的基本思想没有变动,变动之处在于:一是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许多重要策略、表述作了适合时代发展和需要的必要修改;二是把中国革命中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加以总结和概括,以更加准确地揭示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一般规律。

三、《策略》修改对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重要意义

《策略》的修改,实际上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中统一战线实践的基本经验总结 and 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工作的现实理论思考,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方法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完善和发展了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正确处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统一战线的一个基本问题,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策略》的修改,深入总结了在中国革命中共正确处理敌我关系的历史,纠正和弥补了原来的局限和不足,从根本上把握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和变化规律,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有了多方面的发展。与1936年《斗争》本相比,1951年《毛选》本重新审视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其来源问题,纠正了对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估计不足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买办阶级、民族资本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区别,进而把民族资产阶级从反革命营垒里剥离出来,指出“民族资

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革命的动力“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此外,在科学分析地主买办阶级内部的严重矛盾与激烈斗争的基础上,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来反对当前主要敌人的策略思想。相较于1936年《斗争》本,1951年《毛选》本把“那有军阀不是卖国贼了”修改为“那有军阀不是反革命”;^[51]“他们同他们的政党国民党的大群,以及很多的军阀头子,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盘”删改为“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52]把“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营盘”删改为“国民党营垒”;^[53]3次提到蒋介石集团,9次在日本后加帝国主义一词。这些修改,进一步明晰了国民党、军阀不等同于卖国贼,地主资产阶级不等同于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国民党不等同于蒋介石集团、日本不等同于日本帝国主义。这样,就具体充实了争取部分地主买办阶级,分化、孤立和攻击中国革命主要敌人的策略。

第二,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和提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1936年《斗争》本:“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新时期中,这个新时期中,有新形势,有新任务。”^[54]1951年《毛选》本:“同志们!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我们的党已经规定了自己的任务。”^[55]修改后,反映出策略和任务要根据客观的政治形势及其变化来制定。相较于1936年《斗争》本,1951年《毛选》本增加了一句:“观察了反革命和革命两方面的形势以后,我们就容易说明党的策略任务了。”^[56]这说明制定策略任务之前要辩证地全面地分析政治形势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在分析具体形势时,同样注意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如1936年《斗争》本:“我们说,红军部分是失败了,全体是胜利了。敌人部分是胜利了,全体是失败了。这样说对么?对的,因为是事实。”^[57]1951年《毛选》本:“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

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58]这句修改力度较大,毛泽东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整体和部分的原理,辩证地分析了红军战略大转移胜败的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精辟结论。正如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的:“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59]可以说,辩证唯物主义始终贯穿于《策略》的修改过程中,对党和国家制定和修改统一战线策略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第三,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统一战线工作提供指导。统一战线是中共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观点、基本思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统一战线工作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策略》的修改,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有效衔接,满足了干部和群众了解、学习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和中共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需要。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策略》修改的主要内容中。更加强调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有助于提醒全党在任何时期都不能放松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明确把民族资产阶级甚至部分地主买办阶级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和工作范围,符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利用、保护和有限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大批原国民党政要和官兵的思想改造。突出强调了中苏友好的紧密关系和苏联援助在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中的重要性,契合了新中国采取的“一边倒”政策和1950年中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重要背景。总的来说,经过对原文的修改,《策略》既增加了理论深度,又与时俱进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任务和主题,达到了形式与内容完美的统一。它被收入《毛选》后,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学习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热潮。据统计,1951年以来,《策略》已经出版“各种中外文单行本大约60余种”,^[60]在国内外起

到了较好的传播作用。

四、余 论

《策略》的修改,除了因应形势的变化和统战工作的需要,还反映出修改前后毛泽东本人不同的情感体验与心境状态,这需要另外专文讨论。限于篇幅,在此仅举一例。1936年《斗争》本:“因此,斯达林同志在那个时候曾经说过:中国革命要在坚决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条件之下才能胜利。这话是对的么?完全是对的。因此党从大革命失败后九年来,曾经坚决执行了斯达林同志这个路线。党的执行是对的么?完全是对的。”^[61]1951年《毛选》本删除了这段话。故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报告中“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处理资产阶级问题上的错误缺乏认识”。^[62]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段话恰恰遮蔽了毛泽东当时的真实想法,理由如下:第一,从报告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看,毛泽东推动转变政治路线及其策略的重要原因正是深刻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党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关系上“左”倾错误的历史教训和经验。第二,从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和瓦窑堡会议的具体情形看,毛泽东始终反对“左”倾教条者不顾中国实际照抄照搬经典作家的言论。据亲历者郭洪涛后来回忆瓦窑堡会议时说: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对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并指出我们在江西时,对十九路军的问题上有错误,我们本来是可以争取他们一起抗战反蒋的,但没有争取。博古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引经据典,还引了斯大林的话,就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不可能和无产阶级联合。毛泽东一点也不示弱……强调他说的这些是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最后他反问道:“难道这样做(指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中间势力),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博古哑口无言,往床上一躺不说了。^[63]

可见,在瓦窑堡会议期间的争论中,毛泽东从历史和理论相结合的角度有力驳斥了博古不加分析套用斯大林的“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论断,这说明当时毛泽东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处理资产阶级问题上的错误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这显然和1936年《斗争》本这段话的观点存在矛盾和冲突。第三,从当时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看,这段话实际上与遵义会议决议特地写上“一年半反对‘围剿’的报告〔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64]这段表述有异曲同工之处。当时长征刚结束,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并不稳固,一些同志对党的政治路线问题的认识还较为模糊,所以这些问题需要逐步改正,系统总结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时机还不成熟。这段话是毛泽东在党已经开始转变政治路线和策略的情况下,从团结党内同志和维护抗战大局出发说出的,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综上所述,毛泽东在1936年《斗争》本说的这段话是一种策略性的表述,在当时有利于推动党内团结和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在1951年《毛选》本中,毛泽东删除这段话,既不违背初衷,又与新形势相适应。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报告的题目为《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和中国共产党策略任务》。报告原文发表于1936年西北局《斗争》第80期、第83期。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收入了这篇报告。收入时文题改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此后,这篇报告的文题就以此为据。

[2]专题研究论文可参考刘晶芳:《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认识的真实记录——读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4期。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172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81-382页。

[5]笔者在整理史料时发现发表在西北局《斗争》第83期上的该部分报告存在一些页码与实际页数不匹配的现象,所以决定采用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

1949)斗争:西北版1》一书收入的这篇报告。这篇报告是“原本影印”西北局《斗争》第80期、第83期上的,保留了史料原貌。

[6][8][18][22][24][29][54][57][61]毛泽东:《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和共产党的策略任务》,中共中央编:《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斗争:西北版1》,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7、229、230、219、215、219、222、222、232、210、228、216页。

[7][9][10][31][33][35][37][39][42][43][45][47]毛泽东:《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和共产党的策略任务(续)》,中共中央编:《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斗争:西北版1》,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52、361、361、343、333、342、346、333、342-343、341、345、365页。

[11]李捷、于俊道主编:《实录毛泽东》第3册,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422-423页。

[12]据统计,1936年《斗争》本的字数约25600余字,1951年《毛选》本的正文字数约10700余字。

[13]查阅毛泽东著作版本学者所写《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等专著,检索一些民国书刊数据库及查询中国国家图书馆、韶山毛泽东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藏目录,笔者尚未发现新中国成立之前出版的此报告公开发行的单行本,也未发现有新中国成立前有《毛选》收入了此报告。

[14][19][20][23][26][28][30][32][34][36][38][40][44][46][48][49][50][55][56][58][59]《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40、141、143、145、155-156、157、149、155、153、154、157、153、154、156、158、158、159、139、149、147、146-147页。此选集版本信息为“1951年10月北京第1版”“1953年11月北京第4次印刷”,后文不再赘述。

[15]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32页。

[16]在本文统计中,将字、词(还包括连在一起变动的词语)的任何一处变动都视为一处修改。但为方便统计的需要,自然段的删或增、句的大幅度修改、其他处理(如标题、一级标题、题解、注释、字词顺序)的任何变动,只视为整体性质的一处修改。

[17]由于1936年《斗争》本中的标点符号书写不规范,有些地方难以辨认,所以此处没有把两者标点符号的变动作一比较。

[21]参见毛泽东:《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和共产党的策略任务》,中共中央编:《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斗争:西北版1》,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6-218页;《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42页。

[25]毛泽东:《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和共产党的策略任务(续)》,中共中央编:《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斗争:西北版1》,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4页。引文中辨认不清的字以□代替。

[27]毛泽东:《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和共产党

党的策略任务(续)》,中共中央编:《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斗争:西北版1》,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51页。为了方便处理,原文中的空心小圆圈在此处标为着重号。

[41]毛泽东在1936年《斗争》本中强调苏维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地位的依据是因为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九年以来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在中国许多地方的胜利……使得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有了中心支柱。”参见《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40页。

[51]参见毛泽东:《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和共产党的策略任务(续)》,中共中央编:《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斗争:西北版1》,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1页;《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52页。

[52]参见毛泽东:《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和共产党的策略任务》,中共中央编:《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斗争:西北版1》,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6页;《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41页。

[53]参见毛泽东:《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和共产党的策略任务》,中共中央编:《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斗争:西北版1》,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1页;《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44页。

[59]《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46-147页。

[60]施金炎主编:《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第207页。

[62]刘晶芳:《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认识的真实记录——读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4期。

[63]郭洪涛:《欢迎毛泽东到陕北》,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编著:《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1页。相关回忆还可参见郭洪涛:《张闻天同志初到陕北》,《回忆张闻天》编辑组:《回忆张闻天》,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8页;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374-375页。

[64]《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53页。

[责任编辑:陶婷婷]